

邱汉生 张岂之 卢钟锋 步近智 唐宇元
黄宣民 冒怀辛 龚 杰 樊克政 孙开泰
崔大华 柯兆利 姜广辉 任大援
分 撰

《宋明理学史》 下卷

目 录

第一编 明初的理学

概说	3
第一章 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	7
——论三部《大全》(上)	
第一节 三部《大全》的纂修	7
第二节 《性理大全》的朱学印迹	14
第三节 《四书大全》是《四书集注》的放大	21
第二章 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	33
——论三部《大全》(下)	
第四节 《五经大全》的朱学传注	33
第五节 明初朱学统治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41
第三章 明朝开国时期宋濂、刘基的理学思想	55
第一节 宋濂调和朱陆、折衷儒佛的理学	55
第二节 刘基的理学思想	77
第四章 方孝孺、曹端的理学思想	94
第一节 方孝孺的理学和行《周礼》、辟“异端”	94
第二节 曹端的理学	106

第五章 薛瑄、吴与弼的理学思想·····	119
第一节 谨守“朱学矩矱”的薛瑄理学及其学传	
“关中之学”·····	119
第二节 刻苦奋励的吴与弼理学·····	135
 第二编 明中心学的崛起及王守仁 心学的传播 	
概说·····	151
第六章 陈献章的江门心学·····	154
第一节 陈献章的生平及其心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154
第二节 “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学世界观·····	159
第三节 “以自然为宗”的心学宗旨·····	165
第四节 “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	167
第七章 湛若水对江门心学的发展与江门 心学的学术归向·····	170
第一节 湛若水的生平及著述·····	170
第二节 “万事万物莫非心”的心学世界观·····	173
第三节 “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方法·····	179
第四节 湛若水心学思想的独特面貌·····	185
第五节 江门心学的学术归向·····	195
第八章 王守仁的心学(上)·····	201
第一节 王守仁生平活动及“学凡三变”·····	201
第二节 王守仁心学的主要论题：“心即理”、 “知行合一”、“致良知”·····	206
第九章 王守仁的心学(下)·····	230
第三节 “天泉证道”与教育论·····	230
第四节 王学渊源·····	243

第十章 钱德洪、王畿与浙中王学·····	266
第一节 钱德洪的理学思想·····	266
第二节 王畿的理学·····	272
第十一章 江右王学正传邹守益的理学	
思想(附:欧阳德)·····	284
第一节 生平与学行·····	284
第二节 信守师说的理学特色·····	288
第三节 王学正传的历史地位·····	301
第十二章 江右王门聂豹、罗洪先的理学	
思想特色·····	305
第一节 聂豹的生平与学说·····	305
第二节 罗洪先的生平学行与理学思想·····	313
第三节 聂豹、罗洪先理学思想评价·····	329
第十三章 江右王门刘邦采、王时槐、	
胡直的理学思想·····	332
第一节 刘邦采的“性命兼修”说·····	332
第二节 王时槐的“透性”、“研几”说·····	339
第三节 胡直的“心造天地万物”说·····	349
第十四章 南中王门薛应旂与唐鹤征的	
思想特色·····	358
第一节 薛应旂的心学思想·····	358
第二节 唐鹤征《桃溪札记》及《易》学著作的	
思想特色·····	371
第十五章 黄绾、张元忬对王学流弊的批评·····	383
第一节 黄绾的学行与“艮止”说·····	383
第二节 张元忬的理学思想·····	403

第十六章	王艮与泰州学派及其与王学的关系	416
第一节	王艮生平及其思想性格	416
第二节	泰州学派的学术特色及其与王学的联系	432
第三节	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	446
第十七章	泰州后学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的“异端”思想及其对理学的批判	453
第一节	何心隐的乌托邦社会思想	454
第二节	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及其刑狱观点	458
第三节	李贽的反道学	466
第十八章	罗钦顺的思想及其与理学的关系	472
第一节	罗钦顺生平和著作	472
第二节	罗钦顺的理气观和人性论	476
第三节	罗钦顺对杨简、王守仁、湛甘泉的思想观点及禅学之评论	484
第十九章	王廷相、吕坤的反理学思想	493
第一节	王廷相的反理学思想	493
第二节	吕坤的反理学思想	516
第二十章	陈建和《学蔀通辨》	533
第一节	陈建生平和《学蔀通辨》的问世	533
第二节	对朱、陆之学“早异晚同”说的诤辩	536
第三节	对陆、王心学“阳儒阴释”的批评	544
第二十一章	顾宪成的理学思想	551
第一节	顾宪成的学术渊源和理学派别	551
第二节	“理是主宰”的本体论和对《太极图说》的解说	556
第三节	“道性善是说本体”的人性论	559
第四节	“道性善”与对“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论辩	561

第五节 辟佛论	569
第六节 知行观与修养论	571
第二十二章 高攀龙的理学思想和“致用”学说	581
第一节 学术渊源与理学派别	581
第二节 理气观	585
第三节 “复性”说和对“无善无恶”说的论辩	587
第四节 对管志道的“三教统一”说的论驳	591
第五节 “格物穷理”和修悟并重	594
第六节 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	604
第二十三章 刘宗周的思想特征及其“慎独”、 “敬诚”理论	607
第一节 刘宗周的生平和思想演变	607
第二节 “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	611
第三节 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及其心学观点	619
第四节 “良知不离闻见”与“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	624
第五节 辟佛论	631
第六节 提倡“慎独”、“敬诚”之说	635
第二十四章 黄道周的理学思想	643
第一节 黄道周的生平和理学倾向	643
第二节 黄道周的自然观	647
第三节 黄道周的《易》学思想	650
第四节 黄道周的“格物致知”论	655
第五节 “修己以敬”的道德修养论	660
第六节 黄道周的人性论	663
第二十五章 方以智、“易堂九子”与理学	667
第一节 方以智的思想特色	667
第二节 “易堂九子”及其思想	675

第三编 明末清初对理学的总结 及理学的衰颓

概说	695
第二十六章 孙奇逢的理学著作与理学思想	698
第一节 孙奇逢的生平及著作	698
第二节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	704
第三节 孙奇逢的《四书近指》、《书经近指》和 《读易大旨》	711
第四节 孙奇逢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720
第二十七章 《宋元学案》及其对宋元时期 理学的总结	728
第一节 《宋元学案》的编纂成书	728
第二节 《宋元学案》的学术倾向与黄宗羲、 全祖望的治学路径	736
第三节 《宋元学案》对于理学源流和学统师承的辨析	744
第四节 《宋元学案》关于理学史上诸论争的观点	758
第五节 《宋元学案》的体例特点和它在学术 史上的地位	774
第二十八章 《明儒学案》及其对明代理学 的总结	781
第一节 《明儒学案》的学术渊源与学术倾向	781
第二节 《明儒学案》论明初理学	788
第三节 《明儒学案》论明代中后期理学(上)	792
第四节 《明儒学案》论明代中后期理学(下)	806
第五节 《明儒学案》的理学观点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812
第二十九章 李颀的反身悔过之学	823
第一节 李颀的生平及著作	823

第二节 李颀的理学思想	828
第三节 李颀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851
第三十章 陈确与理学	854
第一节 陈确的生平与著作	854
第二节 事事求实的学风	858
第三节 在知行论上与理学的论辩	861
第四节 在人性论上对理学的驳难	867
第三十一章 顾炎武、傅山对理学的批评	874
第一节 顾炎武的学术思想	874
第二节 傅山的学术思想	889
第三十二章 王夫之与理学	909
第一节 王夫之对张载气本论的继承和发展	910
第二节 王夫之对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	916
第三节 王夫之对理学一些基本观念的保留	933
第三十三章 颜李学派的反理学思想	935
第一节 颜元的生平	935
第二节 颜学的理论倾向	937
第三节 颜李学派在理论思维上的经验教训	941
第四节 颜李学说的历史地位及其命运	945
第三十四章 陆世仪的理学思想	953
第一节 陆世仪的生平与著作	953
第二节 陆世仪的理气论	955
第三节 陆世仪的“格物致知”论与“居敬”说	957
第四节 陆世仪晚年对程朱理学人性论的异议	963
第五节 陆世仪思想评价	968
第三十五章 陆陇其的理学思想	972
第一节 陆陇其论“理”、“道”与“太极”	972
第二节 陆陇其的“中庸”论	977

第三节 陆陇其的“居敬穷理”论	979
第四节 陆陇其的尊朱黜王论	981
第三十六章 李光地的理学思想	987
第一节 李光地的生平和著作	987
第二节 李光地的理学派别	991
第三节 李光地的理学诸观点	1003
第四节 李光地编纂的性理诸书	1021
后记	1024
附录一：《宋明理学史》(下卷)理学家生卒年表	1032
二：宋明时期主要理学著作目录	1040

第 一 编

明 初 的 理 学

概 说

由北宋兴起的理学，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这种哲学化的儒学，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自非汉唐时期的儒学所能比拟的。可是，程朱理学直到朱熹去世之后才宣布开禁，到元代才将程朱的经传、集注列为试子程式，成为官学。及至明初，程朱理定于一尊，更进一步强化了它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地位。

明朝不仅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封建帝国，而且它比起宋、元两朝来说，又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这个王朝的君臣非常懂得程朱理学的重要。早在明初开国伊始，即有刘基、宋濂等一批近臣，与明太祖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注解为“规矩”。其后，解缙等人对明成祖朱棣的讲筵、入对，更是君臣唱和。遂于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思想，是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至此，程朱理学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由于三部理学《大全》，只不过是钦定的形式，使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因此对于程朱的经传、集注和接近程朱的其他注解，也只是加以辑集，整齐划一，其目的并不在于发明。这就是章懋说的“自程朱后，不必再论，只遵闻行知可也”，和薛瑄说的“自考亭以后，斯道大明，无烦新著”。明末顾炎武、朱彝尊指责三部《大

全》，尽是“窃取”、“抄袭”，没有新义，对人们的思想起着桎梏的作用。

虽然程朱理学在明初被钦定下来，但是，在明代前期也有一些理学家，他们固然是宗奉程朱，但不是徒守吟诵。他们往往以一种“体认”的方式，发其新义。而其中又因为各自的“体认”不同，“所得”不同，使得明代前期的理学，也呈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这样的理学人物，有刘基、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

刘基、宋濂的理学思想和著作，多成于元末，但其影响和作用，又主要是在明初。其中刘基在理学上是强调天以“理为其心”，以“元气”说为“天理”到“化生万物”之间的中介物，进一步强调了“元气”在“天理”中的位置和作用。他在《郁离子》、《天说》篇中，反对佛、道的鬼神论，以维护儒家“天理”的绝对性。他的《春秋》经解，比起胡安国《春秋传》，不仅发挥夷夏之防的思想，而且使《春秋》学更具有理学的气味。与刘基同出浙东的宋濂，是宋、元以来金华朱学的传衍人物。他强调吾心“天下最大”，以佛教的“明心见性”为“入道之要”。他“饱阅”佛典，称儒、佛“其道揆一”、“同一”，谓学道者当兼儒、佛，因而成为金华朱学“三变”之后的“佞佛者流”。在理学内部，他也主张“折衷群说”，唱朱陆“本一”，其说“有若”元代“和会朱陆”的吴澄。他强调理学不仅修身，而且用世，“立事功”，“著之于民用”。由此他推尊陈亮。这充分反映出明初开国时期的生动气象。

宋濂最得意的门生是方孝孺。但方孝孺与乃师宋濂不同，他是“放言驱斥二氏”，被称为“千秋正学”、“明之学祖”。他忠于君臣大义，面斥朱棣“篡国”，致被磔死，以身殉道，实是一个崇信理学而又被理学扼死的戆迂人物。在理学上，方孝孺认为朱熹而后，不必新著，其要在于道德的实践，指责一些道学人物侈谈性命而行为不

端；主张以小学“养其心志，约其形体”，注重治心悟道，而称朱熹的格物补传为多余；倡言以齐家为治国之本，而齐家治国又以《周礼》的宗法制为“遗典大法”；认为《周礼》可以“经世淑民”，行于今日。

与方氏同时而稍后的曹端，是明初北方大儒，开“河北之学”。其理学多是宋人的议题，好“翻出古人一段公案”，讨论周惇颐提出什么是“孔颜之乐”的问题，把程颢所说道德修养的精神境界，从玄远的天人一体，拉到现实的道德实践中。尤其是他的《戾说》一篇，提出理气“一体”、“未尝有间断”，委婉地不同意朱熹所谓理与气如人之乘马；由此提出了新的论题。当时罗钦顺、王廷相谓曹端提出的理气无“间断”，是“深有体认”，但又嫌其不足。他们发挥曹端理气“一体”之说，提出“理气为一物”、“理出于气”，将理气颠倒过来，引向唯物主义，因而越出曹端本意，但问题却是曹端引起的。在曹端之后，“闻风而起”者是薛瑄。

薛瑄学宗程朱，读《性理大全》，作《读书录》，开山西“河东之学”，门徒遍山西、河南、河北、关陇一带，蔚为北方朱学大宗。其理学发挥曹端理气“一体”之说，谓理散于气，故“气中有理”，理气无“缝隙”。同样，在道与器、性与气的关系上，他认为也是道散于器，性赋于气，故道器不相离，性气相即。由此在心性修养方法上，为求得“一个性字”，他主张当于气中求性。而气即万事万物、日用人伦。所以学道者在日用酬酢的道德实践中，即可获见此性，达到“复性”。于是认为道德实践、恭行礼教本身，就是“复性”。这在朱学中是偏于“下学”，而不重视心悟的“上达”工夫，致使他的理学思想“惛惛无华”，趋于偏枯。其学传至吕柟，又开明代关中之学。关中之学的形成，已进入明代中期，适与王学同时，故吕柟曾与王学有所辩论。但吕柟为首的关中之学，亦以“躬行礼教为本”，同薛瑄一样，也只重视道德实践。在理学上虽然有所议论，但其大端并无

新义，故其学没有生气，最后默然无闻，而为王学所淹代。

与北方薛瑄差不多同时的吴与弼，在南方开“崇仁之学”，亦称朱学大宗。吴与弼与重视下学工夫的薛瑄相反，他是“兼采朱陆之长”，“寻向上工夫”，其学只重上达一路，强调“静中体验”、“静中思绎”的“静观”。其徒陈白沙和娄谅，或“得其静观涵养”，或“得其笃志力行”，俱流衍为王学的“发端”和“启明”。明中期王学的产生，与明代前期理学思想的变化不无关系；虽然王学的产生还有其它的原因，不能仅仅归之于康斋之传。

通观有明一代前期一百多年的历史，虽然有三部理学《大全》的钦定，独尊程朱，但就程朱理学思想来说，宋濂的“佞佛”，方孝孺的戆迂，曹端的《戾说》，在他们对朱学的“体认”中，与朱学往往不能合辙，有的甚至对朱学是“得其半而失其半”。后来薛瑄与吴与弼也是各走极端。薛瑄只重朱学的下学工夫，以至“困于流俗”；吴与弼只重朱学的上达工夫，强调“静观”、“洗心”，以至成为王学的肇端。在明代前期的理学中，由宋濂、曹端到薛瑄、吴与弼，所出现的这些思想变化，致使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被弄得“支离破碎”，这不能不说是王学得以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由北宋兴起的理学，到明代前期又是一大变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真正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另一方面就程朱理学的思想来说，却是不景气，走下坡路。自此以后，直到清中期的汉学出现为止，所谓程朱理学，尽管仍然是统治思想，但已成了一具没有活力的僵尸。

第一章

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

——论三部《大全》(上)

第一节 三部《大全》的纂修

一、纂修经过

《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书，共二百六十卷，修成于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上距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凡四十七年，将近半个世纪。其中《五经大全》一百五十四卷，《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这三部《大全》的纂修，标志着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宋明理学史上的大事。

南宋末年，庆元党禁解除，朱熹的学术才得到统治者认可，不再被视作“伪学”，读书人参加科举，不再要求申明自己不是“伪学”了。但是当时朱学还没有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朝代，不甚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虽然元仁宗皇庆年间，明令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及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但实际上未受重视。少数朱学学者讲学著书，影响不大。其间又不乏和会朱陆的理学家。这种情况盖已绵历一百年之久。

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建议修书，以关、闽、濂、洛，

上接唐、虞、夏、商、周、孔，“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这就已开启了官修理学书籍的端倪，而其用意则在树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载：

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据此可知，明太祖当时即使以帝王之尊，也还是无一定的经典可读，只能杂览《说苑》、《韵府》、《道德经》、《心经》等书。这个从和尚出身的皇帝喜爱读《心经》，旁及《道德经》，自是他的本色，不足奇怪。《说苑》多历史故事，《韵府》则类似辞典，非正式经典。最高统治者的这种读书状况，一方面固属个人的爱好，而更本质的则是反映了统治思想的尚未确立，反映了明太祖并未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拘束。解缙的建议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而发的，其意义有似于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天人对策”，旨在建立有权威的统治思想。由官方修书，而执笔者则为“儒英”，即有地位的“儒”，此时的“儒”就是理学家。书的内容是上溯唐虞三代周孔，下及“关、闽、濂、洛”，即指继承孔孟坠绪的理学。显然，解缙的建议，实开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的先声。

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开始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

（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

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饌。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金幼孜传》：

（永乐）十二年，命与（胡）广、（杨）荣等纂《五经、四书、性理大全》。

《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条：

《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下叙胡广、金幼孜等纂修者姓名官爵），上亲序之。临海陈燧常曰：“始欲详，缓为之。后被诏促成。诸儒之言，间有不暇精择，未免牴牾。虚心观理，自当得之，不可泥也。”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二：

（永乐十三年三月）丁巳，命第一甲进士陈循为翰林院修撰，李贞、陈景著为编修，仍命同纂修《性理大全》等。……

据上引史料，可知这三部大全，原来只是两部，一为《五经、四书大全》，一为《性理大全》，所以永乐上谕，称为“二书”。《国榷》所载，亦称《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前者《五经、四书大全》为圣贤精义要道，后者《性理大全》为周、程、张、朱羽翼六经的著作，性理之言。分称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书，是修成进览时由明成祖确定的。这三部《大全》，开始纂修在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上谕之后，修成则在永乐十三年九月，时间不到一年，仓卒成书，内容“未免牴牾”。开始时，原想纂修得详细些，进度较慢，